

二十世纪风云人物丛书〔图文本〕

ERSHISHIJIFENGYUN
RENWUCONGSHU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七日生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一九七
一年九月十一日逝于苏联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

下

Nikita S.
Khrushchev

争议最大的
苏共最高领导人

Yu CaiQian
余才千等 编著



中苏论战



京华出版社

赫鲁晓夫

余才千 / 等编著



京华出版社

第十七章

认识毛泽东



斯大林七十寿辰宴会上，各国领袖全用俄文发言，斯大林很不满意。

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哦，知识多了也害死人，我就不必担心啰，反正一个俄文字我也不懂。”

接着他用中文发起言来，却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呼，对中国领袖与众不同发言表示敬佩。

斯大林的统治结束之际，恰逢冷战剑拔弩张之时。朝鲜战场上，中国与美国军队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激战。法国士兵正在印度支那陷入泥淖难以自拔。

对于新中国，斯大林始终报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只在有限范围内答允中国所提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在外交政策方面实行了一些大幅度的变动。

1953年7月，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迫使美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不久，复杂持久的越南停火谈判揭开了序幕。到1954年，谈判双方各自作了许多让步，终于签署一项协定，实施停火并将越南分割成南北两方。在此期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也明显地改善了。

苏联领导集团向中国增拨了大笔贷款，以支援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想见识一下迫使头号帝国主义签订停火协定的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人及其领导人。

赫鲁晓夫认为，虽然中国靠苏联很近，但离他们却很远。说

靠他们近，是因为中国是他们的近邻，同他们有漫长的共同边界。说离他们很远，是因为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很少有共同之处。

当赫鲁晓夫未成年时，当时的俄国同中国很少接触，十月革命以前，除了从照片上看到以外，对中国他一无所知。如果偶然看见了一些中国人，也不过是一些到俄国来的丝绸商人。

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同中国人民的领袖孙中山建立了联系。

在内战期间，赫鲁晓夫和中国人有过一些间接的接触，在他服役的那个团里没有中国人，但是在他们的前线有一些中国人。赫鲁晓夫这样回忆道：“我们的红军战士常常说起中国人打仗是如何如何凶猛。俄军士兵拿中国人说话的样子开玩笑——‘给面包，我吃面包，机器干活；不给面包，机器不干活’——不过，说真的，中国人在战斗中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是好士兵，因而也是好战友。”

内战后，赫鲁晓夫开始在顿巴斯做党的组织工作，后来又到尤索夫卡学习。他回忆道：“记得那时我们的报纸经常登载有关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这些文章同情中国人民争取摆脱外国统治，争取进步的政府制度的斗争的。”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夺了权，转而反对共产党。自然，苏联人民是同情为反对蒋介石和其他中国人民的压迫者而战的共产党人的。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上讲了这样一件事：1927年，他在担任尤索夫卡地区党委会的组织部长，有个熟人到尤索夫卡来找他，那人名叫阿赫图尔斯基。在顿巴斯，赫鲁晓夫这一代人都记得这个人是内战中的英雄。这个人早在1919年赶走德国人的战斗中就出了名，后来在反对白卫军的战争中又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装



甲部队的指挥官。阿赫图尔斯基是一位勇士，但是应该说，这个人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达到很成熟的程度，他一半是共产主义者，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像马赫诺。一天，阿赫图尔斯基拿着一张党证出现在区党委会总部，和往常一样，喝醉了。

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给我一个公函，我好立刻到中国去。我要去打蒋介石！我要去参加攻打上海！”

赫鲁晓夫对阿赫图尔斯基说，中国人没有他也会干得很好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不用他帮助就会拿下上海。之所以提起这件事，赫鲁晓夫认为是因为它说明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报纸所激发的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的情绪。

反蒋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们在苏联人民的心中是很有名的。最著名的一位也许是中国红军的司令员朱德，他是最早举起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旗帜的人物之一。此外，苏联人民也知道共产党的主要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和张作霖，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知道得并不多。他在当莫斯科党委书记的时候，刘少奇来过莫斯科，但并没和赫鲁晓夫打过交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共产党同蒋介石有过一些接触。尽管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有些冲突，但他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因此，斯大林——因而也是苏联政府——认为蒋介石是进步力量。日本是苏联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蒋介石符合苏联利益。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民支持蒋介石是因为并不想让他被日本人打败，就像丘吉尔的做法一样，从苏联建立之日起丘吉尔就是苏联的敌人，但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他明智地选择了苏联，支持了苏联。

美国开始威胁日本本土。中国人民开始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苏联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军以后，参与东方战争，在战争结束阶段为击败日本做出了贡献。

苏联共产党比以前更加关心中国了，开始集中力量给予毛泽东以必要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领袖。他需要苏联人民的帮助，以便彻底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苏联红军挥师南下，胜利地占领了东北。日本人被打败了，他们放下了武器，苏联红军把这些武器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移交缴获武器一事，苏联红军同盟友蒋介石签了一些协议。赫鲁晓夫认为，他们当时的做法是把这些武器收拢起来放到某个地方，让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寻找，他们就是这样用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了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这是物质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感谢苏联政府。这里的“苏联政府”，赫鲁晓夫解释为指斯大林，认为斯大林他自己就是政府，他相信他的行动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赫鲁晓夫当时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事情并非全都让他知道，他只知道该知道的事。斯大林作出的有关中国的决定多得不计其数。在这方面，斯大林通常是和莫洛托夫商量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阶段（即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1949年前），斯大林曾派米高扬去南京同蒋介石会谈，让他去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那时斯大林常在吃晚饭时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到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这样怀疑毛泽东的主要根据是毛泽东对攻打上海的做法。当时蒋介石已



经守不住那个城市了，可是毛泽东却不让军队前进，拒不拿下上海。

直到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斯大林才听到了毛泽东对攻打上海的做法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怀疑。

“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斯大林问。

“我们为什么要拿下它呢？”毛泽东回答，“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600万居民。”

很显然，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战争中，毛泽东更多地依靠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赫鲁晓夫这样认为，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农民比工人阶级更革命。他不是打进上海去争取那儿工人的支持，而是担心向上海提供粮食的工作会牵制他的反蒋斗争。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产生成见。

后来，斯大林在向赫鲁晓夫等人叙述这次谈话内容的时候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赫鲁晓夫以斯大林的观点为标准，认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是在1949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为庆祝斯大林70岁寿辰，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

火车到达莫斯科是半夜12点钟，列车在克里姆林宫自鸣钟的敲击声中徐徐驶进车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以及军政领导无一例外地在雅罗斯拉夫车站顶着凛冽的寒风迎候。不过，真正的主人斯大林却没有到。他从来不到车站迎客。

毛泽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月台上受了凉，所以莫洛托夫领导的欢迎仪式不得不简化，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驱车

前往住地。

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斯大林寿辰的庆祝活动。当时，赫鲁晓夫正好从基辅调上来当莫斯科地区党委书记。

“有什么新闻吗？”赫鲁晓夫问斯大林。

“有。”斯大林说：“马察东现在在莫斯科。”

“什么‘马察东’？你说的是毛泽东吧？”

“你知道，就是那个中国人嘛。”斯大林对毛泽东是非常热情的。他几次为毛泽东设宴，斯大林喜欢对他的贵客表示热情，也知道怎样做才能很好地表现出自己的热情。

但是，在毛泽东逗留期间，斯大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去看他一眼。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泽东，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有些风言风语就开始流传，说毛泽东一点也不愉快，他被紧紧地关在屋子里，没一个人理睬他等等。毛泽东传出话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了。斯大林听到毛泽东的埋怨之后，他又给毛举行了一次宴会。斯大林很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同毛泽东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是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

给斯大林庆祝70寿辰是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

世界各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主席台就座，以便轮流登台发表词藻华丽的祝词。几乎所有人的发言都是用俄语来宣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

“他们干嘛用俄文演讲，难道没有本国的语言吗？”斯大林不满地问庆典的主持人，嗓门相当高。

“请问，斯大林说了些什么？”坐在一边的毛泽东转过脸来问当时还只是翻译的费德林教授。

听完费德林的翻译后，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话说：“哦，



知识多了也害死人。我就不必担心啰，反正一个俄文字我也不懂。”

主持人结结巴巴地对斯大林说：“我们的来宾事先准备的都是俄文稿，现在不好改了。”

轮到毛泽东发言时，他请费德林同他一同走上讲台，以便他讲完后可以立即翻译成俄文。

剧场里发出热烈欢呼。听众对来自中国的领袖表示欢迎，对他这种不同于别人的发言表示赞赏和敬佩——它象征着友好和尊严。

会谈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孔采沃别墅进行的，而且常常是在深夜。会谈时，斯大林坐在大桌子的顶头，接下去是严格按名单次序排列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位置紧挨着斯大林，只有翻译坐在中间。中国代表团按名单依次坐在毛主席旁边。

会谈话题广泛，没有严格议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双方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了看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基本条款便是在这种气氛中达成的。

1950年2月14日，苏中双方的代表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了条约，斯大林、毛泽东，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在军事战略方面，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制止日本以及在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行为中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就是说，如果其中一国遭到日本及其盟友的侵犯，另一国将立刻提供军事援助或其他物质援助。

根据条约，两个邻国愿根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双方还表示，愿本着真诚合

作的精神，参加一切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为加速其实现而贡献力量。双方相信，加强苏中两国的睦邻关系和友谊，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同意本着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原则，在涉及苏中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上互相磋商。

缔约双方承诺，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来发展和巩固苏中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相互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

除中苏条约之外，毛泽东和斯大林还就中东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内容达成协议。

苏联政府同意将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签订对日和约后，苏军将撤出双方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工程建筑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晚不得迟于1952年末。中国政府则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为恢复和建设上述工程所支出的费用。

双方还决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立即研究大连港问题。不久，大连就移交给中国。

苏联政府还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以支付苏联给中国提供设备和其他物资的费用。双方协议贷款额为3亿美元，年利优惠为1%。

毛主席在苏联待了近两个月，办成了很多事，双方都很满意。签约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晤谈的顶峰。无论就其意义还是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签约实现了列宁的预见，也实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理想。

当然，这次会谈也涉及到了新疆问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上



是这么说的：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新疆问题提出来了。我记不得，是毛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呢，还是通过米高扬同志处理这件事的。米高扬是我们派到中国去同毛打交道的第一任代表。

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占领新疆并在那里设防，把它封锁起来使蒋介石无法染指。我们占领这个省既对苏联有利，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利。到共产党人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为止，新疆一直在我们的管辖之下。那儿有我们自己的人，整个省当时都在为我们工作。然而，红军胜利之后，斯大林还是向毛承认新疆属于中国。

毛主席临别前在莫斯科车站讲话时表示，中苏两国人民在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和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通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对中苏两大国的繁荣产生影响，而且必然要对人类未来，对全世界的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产生影响。

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在中苏友好的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在苏联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对待新疆问题上，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上这样写道：

他向毛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

的天然资源。中国人民未提异议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对这个主意无疑是很不高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苏联在打新疆的主意。一定会认为这个机构是对中国领土和独立的侵犯。这样，斯大林就在中国撒下了敌意和反苏、反俄情绪的种子。

我对斯大林说，中国人很可能会反对我们像过去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那样向他们索取贸易特权。

听了我的话，斯大林厉声斥责我说：“你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它跟你有什么相干？”

接下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毛泽东给苏联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建立橡胶种植园。

毛泽东的回电是这样说的：“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毛泽东不卑不亢的回答，对斯大林来说如同一剂必须吞下的苦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与互利的，而这种平等与互利又必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

还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对菠萝罐头感起兴趣来。他指示马林科夫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说苏联希望中国拿出一块地方来让苏联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赫鲁晓夫当时也在场，斗胆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



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话很不高兴，瞪了他一眼，赫鲁晓夫立即就不敢再做声了。电报最终还是拍出去。

两天后，苏联人收到了中国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赫鲁晓夫看到电文在一旁默不作声，庆幸此事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斯大林则在那里发火骂人。

赫鲁晓夫知道：这件事（指建橡胶园的事）肯定在毛的心上留下了痕迹。他同斯大林打交道的经验，先是新疆问题，现在又有橡胶园问题，足以使他相信：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有许多雷同之处。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很精细，没有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相反，却故意向斯大林表示尊敬。

例如，他请求斯大林推荐一位文笔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去帮助他编辑他的许多演说和文章。毛泽东正准备出版他的选集，需要一个人检查他的著作以免出错。

不用说，斯大林对此感到很高兴。他把毛泽东的请求看做是毛泽东无意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标新立异的一种迹象。斯大林以为毛泽东这样做是表示他愿意用斯大林自己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赫鲁晓夫却认为：毛泽东也正希望斯大林会这样想，毛泽东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据毛泽东的请求，斯大林把尤金派到了北京。斯大林挑尤金去帮助毛泽东出版其著作不是偶然的。尤金是个哲学家，因此是毛泽东可以与之谈论哲学的人。毛泽东喜欢谈论哲学，不管跟

谁接触，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他总要大谈一通哲学问题——赫鲁晓夫这样认为。

尤金一到北京，就开始发回一连串电报，热情洋溢地讲了毛泽东的许多优点。尤金说，毛泽东常去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说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坐到深夜一两点钟——谈的并不是编辑毛著问题，而是一些重大话题。

虽然尤金同毛泽东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且作为毛著编辑为苏中友谊做出了贡献，但是直到斯大林死后他才成为苏联的驻华大使。斯大林当时任命了一位战时曾当过人民委员的铁路专家来担任此职。赫鲁晓夫记不起这个专家的名字了，只记得日本人在华北失败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东北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苏联驻东北的全权代表。斯大林把他视为亲信。

苏联的这位代表开始向苏联领导班子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及其共产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苏联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提到的人里面没有毛泽东，但毛泽东对在中国领导班子中散布反苏情绪的那些同事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斯大林把大使送来的某些文件拿给赫鲁晓夫等人看，因此，赫鲁晓夫才了解了其中的内容。

赫鲁晓夫回忆道：

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有一次，沈阳（高岗的总部所在地）举行庆祝游行，有些中国军官对我们送给毛泽东的军队的经过修理的苏联坦克发牢骚，嘟嘟囔囔地说：“俄国人把大批陈旧破烂的坦克都塞给我们了。”只要有这种深深埋在人们心里的不满，每一点小



事都会被夸大，而且会成为严厉责难苏联的根据。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我们那位代表报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泽东看，对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友好表示。

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对我们友好的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泽东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看法显然带着强烈的个人成见，赫鲁晓夫就是这样，有时候看问题有些偏激。

1954年，苏联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决定让赫鲁晓夫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除了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外，代表团成员还有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谢列平、《真理报》主编和乌兹别克人民的代表纳斯利金诺娃。

代表团被安排到中国参加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中国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赫鲁晓夫的代表团。赫鲁晓夫因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有机会同中国同志进行讨论而感

到高兴。

代表团的很多人都遇到了一个适应新习惯的问题。他们领教了中国绿茶的威力。

代表团每到一个地方，中国人都要敬茶——茶、茶、茶，这是中国人款待客人的主要方式。只要你坐下来谈话，他们就要在你的面前放一个带盖的茶杯。按照中国的习惯，如果你不立即把茶喝掉，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去，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最后他们给你一块蒸过的毛巾擦手擦脸。用这毛巾擦一擦手脸，赫鲁晓夫感到的确会使人觉得很清爽。然而喝茶就不一样了。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喝不下为止。第一次访华后期，赫鲁晓夫拒绝喝茶——一是他喝不惯绿茶，二是他喝不了那么多。

布尔加宁倒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做了，结果闹了失眠症。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问他：“您是不是一直在喝绿茶？”

“是的。”

“喝了多少？”

“很多！”

“如果您继续喝那么多的茶，失眠就会更严重了，您要么减少喝茶量，要么干脆别喝了。茶里面含有少量毒素，使你睡不好觉。”

布尔加宁听取了医生的意见，后来他的睡眠又恢复了正常。

赫鲁晓夫在同中国人的会谈中，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赫鲁晓夫认为：“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度，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做出贡献，并安排一些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苏联人同意给中国派遣军事专家，给他们运去了大炮、机关